

凯末尔改革中的苏联因素及其作用

● 李瑞居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凯末尔改革的参照物不仅仅是西方先进国家,正在发展强大的苏联越来越引起凯末尔的关注,可以说凯末尔初期的改革受到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影响大一些,随着改革的深入,苏联因素的影响逐渐加大,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凯末尔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就是受苏联因素影响的典型,苏联工业化的经验是凯末尔国家主义借鉴的主要蓝本,土耳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实行的,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关键词:凯末尔改革;西方因素;苏联因素

中图分类号:K5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58(2010)01-0304-02

一、引言

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耳其凯末尔改革,是资产阶级民主化改革的一个典型,给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参考。学术界对凯末尔改革的专著很少,刘竞主编《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论述了彼得一世时起到20世纪80年代初近300余年沙俄与苏联和中东国家的关系史,由于时间跨度大,涉及国家多,对凯末尔改革时期与苏联的关系也只是一笔带过;肖宪等著的《沉痾猛药——土耳其凯末尔改革》(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突出了凯末尔本人及其改革,但对外部因素尤其是苏联因素的影响很少论及。国内外研究凯末尔改革的论文非常多,国外有Hans Kohn, Hans Kohn, Ten years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Fitzroy Maclean,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modern dress; Walter Livingston Wright Jr, Truths about turkey等等。国内如彭树智《凯末尔的改革》、《凯末尔的对外政策》,黄维明《凯末尔与国家主义》,黄志高《凯末尔革命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共产国际、苏联的对华工作》等等,这些文章都涉及到凯末尔改革,但都对其中的苏联因素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凯末尔改革中苏联因素的探究,以对凯末尔改革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二、凯末尔改革及影响因素

凯末尔改革是在凯末尔革命胜利的前提下进行的。凯末尔革命(1919~1923)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为首的土耳其资产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瓜分、捍卫民族独立主权和建立民族国家为目的而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土耳其通过凯末尔革命,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束缚,在政治上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但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多次战争的破坏,土耳其共和国经济十分落后,工业不发达,贸易逆差也非常严重,法制不健全,社会生活中宗教色彩过浓,这些严重阻碍着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因此,一个行之有效的对政治、社会、社会文化方面

的改革迫在眉睫。

凯末尔改革大体包括世俗化的社会改革、民族化的文化改革及国家主义的经济改革三个方面。其宗旨在于力图革除封建神权的遗毒,借鉴世界一切文明成果,使土耳其走出困境,走向富强。

1. 凯末尔改革中的西方因素

凯末尔改革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先进生产力,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例如,受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1924年3月,土耳其废除了哈里发制度,4月大国民议会宣布立法权属国民议会,撤销宗教和教会事务部,封闭宗教学校,废除宗教法庭。1926年大国民议会颁布了一系列参照西方法律制定的新法,废除多妻制和随意休妻等限制妇女权利的制度。

同时,在社会生活方面,凯末尔又实行了“帽子革命”,禁止戴费兹帽,所有国家职员必须戴礼帽,在办公室应该脱帽,要像欧洲人那样互相打招呼等等,这些也是仿照西方的生活方式所做出的改革。另外还规定,没有正式宗教职务的人一律不准穿用宗教袍服或佩戴宗教徽记,1928年宪法中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被取消,1926年用格里高利历取代伊斯兰教历,1935年把星期日改休息日,1935年禁止妇女戴面纱……同时还规定学校取消宗教课程。

凯末尔经济改革初期的经济政策也是受西方经济制度的影响。凯末尔大胆引进外资,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积极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1927年,土耳其政府颁布了《奖励工业法》,给予私人企业免征免稅,降低运输价格等一系列优惠条件。这使土耳其的私人企业确实有了一定的发展。

2. 凯末尔改革中的苏联因素

如上所述,在凯末尔改革初期,西方因素的影响较大,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困难也逐渐加深。在国内,由于受传统轻视工业,注重经商的观念的影响使国内的工业很不景气,而土耳其为恢复国际

* 收稿日期:2009-09-22

作者简介:李瑞居(1986-),女,甘肃静宁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史(现代国际关系史)。

信誉以争取国外的投资,从1928年开始偿还奥斯曼帝国所欠的高达8600万里拉的外债¹¹,再加上1929年全球爆发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刚刚恢复的土耳其国民经济困难重重。在西方经济制度遇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时,以凯末尔为首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将眼光放到了日益发展壮大的苏联身上。

1925年12月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苏联开始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存在过度集中、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与发展速度、行政命令盛行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苏联在1928年开始的五年计划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当时金融危机笼罩全球的情况下,苏联模式无疑是一个亮点。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凯末尔最后决定效法苏联,在社会经济领域内推行国家主义,即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来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

当然,苏联在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和共和国创建初期给予土耳其的巨大的物质资助,也是凯末尔想效法苏联的原因之一。一战过后,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在1921年《土苏条约》的基础上友好和平地发展,两个国家发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世隔绝,需要互相给予支持。开始时,土耳其由于国内政治的缘故,对苏联政府毫不让步,两国的交流是建立对在土耳其共产党严厉镇压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没有影响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但最终土耳其发现,它在很多方面非常需要苏联的帮助。

这样土耳其由经济改革初期的推行发展私人经济转变为由国家干涉社会经济生活和有计划的发展民族经济的新阶段。1933年,凯末尔在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聘请苏联专家来土耳其,制定了发展土耳其民族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凯末尔很早就有国家主义思想的萌芽,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着手实施。1932年,土耳其共和国总理伊诺努访问了苏联,以学习工业化建设的经验。苏联提供给土耳其800万美元资金,用来支援土耳其的五年计划。接着,大批的苏联专家来土耳其指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并筹划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虽然第二个五年计划由于二战的爆发没有推行,但在苏联的指导下,土耳其借鉴了许多苏联工业化的经验,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苏联体制的影响在凯末尔国家主义政策中得到很好的展示。从凯末尔国家主义的运行情况来看,国家主义明显属于计划经济的范畴。而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也只有苏联在大张旗鼓地实行计划经济。虽然土耳其经济在本质上是民族资本主义,但是凯末尔效仿苏联,实行工业化的举措是毋庸置疑的。

土耳其政府为了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先后创办了苏美尔银行和埃蒂银行,以此来控制工矿、商业、电力等生产部门,并及时向企业提供资金。据统计,到30年代末全国铁制品生产的100%,钢制品生产的80%,人造丝制品生产的35%,水泥制品生产的55%,均被美苏尔银行所控制。而埃蒂银行则控制了土耳其全部的煤矿和铜矿的生产以及一半以上的铬矿与硫磺矿的生产¹²。土耳其的农业银行承担了资助和调控农业生产的职能。从土耳其三大国有银行对土耳其国民经济的控制可以看出,凯末尔的国家经济实际上是苏联计划经济的翻版。

在优先发展国有经济的同时,凯末尔还实行对外资企业的国有化改造,土耳其建国之初,国有经济中的外国资本一直占绝对优势。由英法控制的奥斯曼银行,享有发行纸币的特权,外国资本控制了土耳其农产品出口的50%—90%。土耳其政府尽一切努力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外资其余收归国有,用赎买的方式,逐渐将铁路、码头、

矿山等收归国有。

凯末尔改革中除了国家主义的实施与苏联有很大的关系之外,在政治上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冲突。我们都知道,凯末尔改革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在后期经济改革中又大规模地采用苏联的管理模式,接受苏联的援助。这种经济上的合作难以避免政治上的冲突。土耳其在与苏联合作的同时,又严格镇压国内的共产主义分子,一方面努力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顺应苏联的指点,穿梭与苏联与西方之间,这贯穿于凯末尔改革的全过程。

三、凯末尔改革中苏联因素的作用

1. 经济作用

凯末尔改革的经济作用,主要是苏联对凯末尔的国家主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影响。国家主义是凯末尔的六项原则之一,土耳其在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是第一个执行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是除了前苏联之外第一个采用中央指令性计划概念,并像前苏联那样把发展重心放在工业化上的国家²。

苏联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是凯末尔借鉴的主要蓝本。土耳其致力于发展农业,实施土地改革和合作经济,国家银行以比较优惠的方式提供借贷,创办一些农业学院和培训机构来帮助土耳其农民。在工业和贸易上,政府鼓励通过减免税收和关税的方式建立国有企业,强制土耳其政府机关和员工使用土耳其的产品。为推行“国家主义”,凯末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创办银行,以此控制工矿、商业、电力等部门,并向企业提供资金,修改国家进口税则,限制外国货的输入,由国家出资逐步收回外资铁路等等。土耳其的工业年产值从1928年的4000万里拉增加到1932年的一亿里拉。

1934年,土耳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国家直接投资兴办一系列企业。以“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土耳其民族工业的发展。它不仅使土耳其比较顺利地渡过了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且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奠定了基础。

土耳其不仅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也在国家的保护下逐步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土耳其建立了制糖、火柴、造纸纤维、人造丝等工业,扩大了棉纺工业,建立了开采硫磺和炼焦工业。据统计,土耳其注册工业的总产值1927年为0.58亿万里拉,1939年增加到3.31亿里拉。连接安纳托利亚东西两部以及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新铁路,也用国家资金建筑起来了。1924年到1939年,土耳其修筑了近4000公里的铁路,全国铁路总长达到6950公里。土耳其政府又不断从外国承租者手中赎回租让企业,到1939年,几乎所有的铁路、码头、船坞、煤矿和城市公用事业都转入土耳其政府手中³。

2. 政治作用

凯末尔改革以前土耳其与苏联一直处于对抗状态。两国的敌对状态可追溯到17世纪晚期。1628年奥斯曼帝国被欧洲十字军击败,这场失败成为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开端,在18世纪,俄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沙皇政府一直力图寻求地中海的出海口,而土耳其的存在成了它最大的障碍。因此,他们在地理上的靠近成为他们长期战争的根源⁴。直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时,俄土之间的冲突还在继续。

一战后,苏俄政府和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反对西方势力上走到了一起。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给土耳其民族(转第308页)

4. 把改革纳入法制轨道、依法治国

清末新政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法令和章程,但这些只留于形式而不重视实质精神,最终成为一纸空文。就如清末铁路国有问题,清政府无视自己已颁布的法令,仅凭一纸圣谕就废除,这使人们看到了新政的虚伪与欺骗性,进而引发了保路运动,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一定要注重法制建设,将现代化建设纳入法制轨道,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清除以人治国的流毒,切实保护各阶层人民的权利,创造一个安全、稳定、公平的社会环境,这样才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5. 重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的连续性

清末新政在1908年慈禧和光绪去世后出现了权力真空,其继任者没有控制整个局面的权威,这也是新政失败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晚,基础差,因此,转型期持续的时间也长,这就需要连续出现几位既有改革热情、又有改革能力的领导人将改革不间断地推行下去,因此,政权的顺利交接、政策的连续问题也就尤为重要。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历经60年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下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党领导的有力量以及我们政策的连续性。

6. 正确处理对外关系和外来文化

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外国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相互勾结,祸乱中华,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因而,遭到国民的唾弃,民心背离。以现代化为目标取向的改革势必要求政府与外国合作往来,但在此过程中,改革集团不能像义和团那样盲目排外,更不能因贪图小利而丢掉民族主义气质,牺牲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应该有策略性的迂回,但更要有原则性的鉴定,时刻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对外交往的第一准则,这样的政府才是人民希望看到的政府。

清末新政于今已有百余年了,虽然它是个失败的案例,但古人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清末新政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改革,对当今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它能使我们认识一个后发国家现代化历程的艰难复杂,也能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现代化获得成功各种制约条件,从而为我们更好地发展当今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和经验。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争取早一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应抓住改革的有利时机,把握改革的重点,注意改革的全局,并用法治手段为改革保驾护航,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才能早日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参考文献:

- [1][2] 光绪朝东华录(四)[Z]. 北京:中华书局,1954. 4602, 4601.
- [3]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79. 761.
- [4] 肖功秦.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M]. 上海三联书店,1999. 136.
- [5] 周积明.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困境[J]. 社会科学辑刊,1996(2): 91.
- [6] 罗兹曼. 中国的近代化[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138.
- [7] 光绪朝东华录(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4224.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03.

策。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就是1920年4月26日凯末尔致列宁的信件。凯末尔在信中提出土苏建立外交关系,并请求在土耳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帮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6月3日的复函中,表明苏俄政府同意苏土之间建立外交领事关系,并强调说:“苏维埃政府十分高兴地注视着土耳其人民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在土耳其目前艰难的日子里,苏维埃政府为使土俄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友谊奠定牢固的基础而感到荣幸。”^[5]在1921年3月16日,在莫斯科缔结了苏俄与土耳其之间的友好条约《俄土条约》。1925年,签订《俄土友好条约》,1935年又将友好条约延长了10年,这对于巩固土耳其民族政权,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935年11月,两国政府在安卡拉签订议定书,它打破了西方各国对土耳其外交上的孤立,在道义上支持了土耳其。

当然,这种‘机会主义的友谊’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冲突。比如莫斯科对1923年6月24日在洛桑举行的海峡会议不甚满意,根据海峡会议,将会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控制海峡的通航,而且海峡区域将会被非军事化。这将对苏联产生不利的影响,使其军队无法在土耳其海峡自由航行。不过,纵观凯末尔改革期间的土苏关系,还是以合作为主,对双方来说是利大于弊的。这种政治上的对话为经济上的合作开辟了道路,这样才使苏联对土耳其的经济援助成为可能。

四、结语

凯末尔改革在土耳其和整个世界现代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使土耳其摆脱了殖民掠夺与封建束缚,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而且给其它为巩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国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凯末尔改革在总体上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但其中夹杂着许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凯末尔改革中,西方因素是主流,但不可忽视苏联的作用,正是由于苏联对土耳其施加的影响,才使凯末尔改革从最初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深入到经济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2] 黄维民. 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22, 224-225.
- [3] 黄维民. 凯末尔与国家主义[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
- [4] 张深溪,郑福才. 凯末尔改革与土耳其的新生[J]. 洛阳大学学报(3).
- [5] *Report on the Bosphorus and the Dardanelles by Foreign Office Research Dept.*, 6 Jan. 1947, FO 371/96550; Edward Weisb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1943-45): Small State Diplomacy and Great Power Politics (US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2-3; Bruce R. Kuniholm,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Iran, Turkey and Gree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6; George McGhee, *The US-Turkish-Nato Middle East Connection: How Truman Doctrine and Turkey's Nato Entry Contained the Soviets* (London: Macmillan, 1990). 10.
- [6] 黄维民. 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33.
- [7] Mustafa Sitki I Bilgin and Steven M orewoo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Turkey's Reliance on Britain: British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Support for Turkey against Soviet Demands*, [J]. March 2004. 25 (Published by Frank Cass, London). 1943, 40(2): 47.

(接第305页)

革命战争以很大的支持,同时凯末尔也对苏联采取和平友好的政